

# 欧元区多种资本主义模式的 兼容性问题探析\*

——理解欧元区的宏观经济失衡和改革方向纷争

蒋尊泽\*\*

**【内容提要】** 以欧债危机的爆发为关键节点,欧元区成员国的发展失衡引人瞩目,欧元区北方国家拥有较好的制造业竞争力并有效地控制了债务,而南欧成员国则缺乏制造业竞争力并陷入了债务危机。后危机时代,以德国为首的债权国集团与法国领导的债务国集团就欧元区制度改革的方向问题存在分歧,债权国集团追求稳定为导向的欧元区,而债务国集团尝试增加欧元区宏观经济制度的干预能力。本文基于资本主义多样性视角,通过考察欧元区的比较政治经济基础,解释欧元区成员国分化发展的方式和原因。欧元区成员国的资本主义模式存在多样性,每种资本主义模式在历史上形成了与其发展需求相匹配的货币制度。北方出口导向型资本主义偏好稳定性的货币制度,而南欧内需导向型资本主义模式偏好干预性货币制度。法国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有干预性货币制度传统,在欧元区创设阶段尝试转向稳定性货币制度,又在欧债危机后再次追求干预性货币制度。欧元区的矛盾是结构性的,货币联盟只能

---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逆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转型论’反思与国家类型重构研究”(批准号:19XCJ02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感谢宋新宁教授、王正毅教授、韩彩珍教授、田野教授、李巍教授、保建云教授、翟东升教授、尹继武教授、赵晨研究员和张勇研究员的宝贵意见。

\*\* 蒋尊泽,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提供一个“一刀切”的货币政策框架，但单一的货币政策框架很难满足成员国多样性的货币政策需求。由此，出现了欧元区不同资本主义模式的兼容性问题。欧元区货币制度与不同资本主义模式的匹配程度不同，因此诱发了欧元区的经济发展失衡，并最终危害了政治团结。

**【关键词】** 欧元区 资本主义多样性 制度互补性 货币制度 欧债危机

货币统一是欧洲一体化战略进程中的必要一环，承载着建立一个和平与繁荣欧洲的战略愿景。在理想状态下，欧元区应该促成成员国之间的共同繁荣，但遗憾的是这并没有成为现实。欧元区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欧元区北方国家较为顺利地应对了危机冲击，而南欧国家经济陷于持续的困境，如今欧元区正因内部经济发展失衡问题而备受困扰。本文将欧元区宏观经济失衡发展的困境归因于不同资本主义模式在共同货币区中的兼容性问题，尝试从不同成员国的货币制度需求入手，探求为何欧元区通过共同货币促进成员国经济共同繁荣的愿望会落空。

## 一 问题提出：欧元区为何没能促进成员国经济实质趋同？

欧元区成员国将货币主权让渡给超国家机构，共同使用欧元并遵循欧洲央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在这一条件下，能否促进欧元区成员国经济实质趋同是欧元区良好运行的一个关键环节。如果能够实现欧元区成员国经济实质趋同，则各国宏观经济行为足够相似，不同成员国对货币政策的需求较为相近，单一货币政策的成本容易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而如果成员国经济差异显著，不同成员国需要不同的货币政策，则在欧元区的单一货币政策框架下，容易出现政策偏向性，一部分成员国适应欧元区政策而另一部分成员国难以适应，这种情况下，成员国共同受益的难度加大，单一货币政策可能会造成欧元区赢家和输家之间的纷争。如今欧元区所面临的一系列困境，重要的根源在于欧元创设之初促进成员国经济实质趋同计划的失败，与欧元区创设者的想法相反，欧元并没有引导成员国经济走向趋同，而是造成了发展的失衡。

欧元区建立之初，成员国经济的发展差距就显著存在，但欧元区的创设者认为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市场机制予以克服。《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成员国在加入欧元区前需要完成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数“趋同标准”，作为加入欧元区的门槛。<sup>①</sup>更为重要的是，在欧元区的设计理念中，市场自由主义理念占据了主导地位，认为只要政治家们努力扫清市场机制有效运转的障碍，欧元区各国就会在市场力量的引导下重新配置资源，具备完善理性的经济行为体会听从市场信号的引导调整自身行为，适应欧元区新的制度环境，而成员国之间发展模式最终也会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走向趋同。这一理念突出体现在欧洲共同体委员会1990年10月发布的《一个市场，一个货币》报告中。报告认为落后地区的成本优势将会在加入统一大市场后得到充分的发挥，先进地区资本和企业有外迁谋求利润的动力，辅之以共同体政策弥补落后地区资源和禀赋方面的不足，会助力于落后地区的追赶进程，最终实现欧元区成员国经济的实质性趋同。<sup>②</sup>

在欧元区正式运行的前十年，以市场力量推进欧元区成员国经济实质趋同的愿景取得过阶段性的成功，欧元区南方国家名义经济增长率快于北方，欧元区南北之间的经济差距被认为显著缩小。在庆祝欧洲经济货币联盟运行十年的报告中，欧盟委员会认为推进欧洲经济趋同是欧元十年的主要成就之一：“欧洲货币联盟为参与追赶进程的成员国带来了重大利益。宏观经济稳定和低利率的环境，加上凝聚政策及其结构性和凝聚性基金的支持，为加速追赶创造了条件；国家金融市场与欧元区其他国家的发展和一体化，加强了健全经济政策的积极作用”。<sup>③</sup>

然而，欧债危机打破了这种趋同幻觉，欧元区的经济失衡问题被暴露在阳光之下，呈现出了显著的南北失衡。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以德国为代表的欧元区北方国家，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集中于银行业，其造成的不良影响总体可控。

---

①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趋同标准”规定了加入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需要达成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标，包括通货膨胀率不超过通货膨胀率最低的三个国家的1.5%；平均名义长期利率不得高于利率最低的三个国家的2%；成员国预算赤字不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国债不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60%；汇率至少两年内保持在中央汇率附近2.5%范围之内。

② 《一个市场，一个货币》报告认为，从通货膨胀率 and 生产力趋同视角出发，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丹麦和爱尔兰已经达到了成立货币联盟的条件，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还需要一些调整，而希腊和葡萄牙所需的调整问题将更加艰巨。参见：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One Market, One Money: An Evaluation of the Potential Benefits and Costs of Forming a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European Economy*, no. 44, October 1990, pp. 11–12, <http://aei.pitt.edu/98210/1/44.pdf>.

③ European Commission, “EMU@10: Successes and Challenges after 10 Years of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European Economy*, 2/2008, p. 5, [https://ec.europa.eu/archives/emu10/emu10report\\_en.pdf](https://ec.europa.eu/archives/emu10/emu10report_en.pdf).

但是,南欧地中海沿岸国家则陷入了严峻的流动性危机,并最终因政府对银行业的救助而陷入主权债务危机。危机提示研究者关注欧元区成员国发展轨迹的差异,欧元区前十年所实现的经济趋同更多只是名义经济增长数据上的接近,事实上,欧元区存在严重的经常账户失衡,北方国家经常账户盈余而南方国家经常账户赤字。如果从经济运行方式来看,欧元区北方国家维持住了自身生产竞争力,能够支撑产业创新和出口导向性发展,而南方国家的经济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主要依靠消费市场和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攀升,并因此陷入了经济金融化,积累了巨额的债务。在欧元区建立的前十年,北方国家的盈余通过资本自由化浪潮流向南方国家,为南方国家提供了充足的低息贷款,支持了南方经济的表面繁荣,但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因其金融市场警觉,北方廉价贷款提供者选择谨慎观望时,南方基于国际廉价贷款的经济繁荣戛然而止。<sup>①</sup>

危机治理进程进一步恶化了欧元区经济失衡的局面,紧缩政策的推行使得南欧国家经济持续低迷。欧元区以北方国家为代表的债权人集团和以南欧国家为代表的债务人集团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以德国为首的欧元区北方国家坚持建立一个以稳定文化为中心的货币联盟,担忧对债务危机国家的纾困和援助将助长道德风险,因此主张严格一致地执行欧元区规则,让南方盟友自己承担不负责任的财政和社会政策的苦果。陷入债务危机的南欧国家则在法国的领导下形成了另一阵营,这一阵营呼吁一种灵活务实的立场,将债务问题界定为临时的流动性问题,强调建立财政转移支付机制的重要性,呼吁由盈余国家向债务国提供贷款,认为债务救助问题的早日解决对于整个欧元区的良好运转是一件好事。<sup>②</sup>在欧债危机的解决过程中,南欧债务国被迫接受了以内部贬值为核心的紧缩政策,需要削减公共开支和增加税收,并进行结构性改革,这些措施造成了南欧国家长期的失业率上升、工资下降、资产价格通缩和经济衰退,这使得欧元区南北失衡问题更加严峻。

欧元区内部经济失衡问题的持续发展意味着欧元区创设时期市场自由主义设想的失败,市场自由主义逻辑假设了每个国家在加入欧元区后的宏观经济调整的

---

① 艾丹·里根:《欧洲资本主义多样性中的政治紧张关系:欧洲民主国家的危机》,陈凤姣译,《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7期,第40—53页。

② Jeffrey Frieden and Stefanie Walter,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Eurozone Crisi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0, no. 1, 2017, pp. 371-390.

同质性，认为市场力量将天然地造成欧元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如今，伴随着欧元区经济发展的持续失衡，这种图景被认为是过于理想化的，而如何理解欧元区经济的分化发展则成为理解欧元区治理困境的关键问题。<sup>①</sup> 本文认为必须考察各国经济的异质性，才能理解欧元区成员国之间经济的分化发展，应该从欧元区成员国的比较政治经济基础入手，理解单一货币政策框架对不同成员国的不同影响。关键的一环在于解释为何欧元区成员国货币政策需求存在深刻差异，这种差异没有因加入欧元区而改变。

## 二 分析框架：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视角下的欧元区

本文从资本主义多样性视角出发，研究欧元区成员国资本主义模式的差异和加入欧元区后发展轨迹的分化，其核心的关注点是两个方面。其一是识别差异。欧元区成员国中存在不同的资本主义模式，不同模式对应的货币制度需求不同，由于资本主义模式存在惯性，这些货币政策需求并没有因为加入欧元区而发生根本性改变。其二，从制度变革视角出发，研究欧元区带来的国际国内制度变革冲击对不同资本主义模式的不同意义。欧元区以统一的货币制度取代各个资本主义模式的传统货币制度，并因此产生了制度环境重塑问题，欧元区新的货币政策在与不同资本主义模式的嫁接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认为，不同资本主义模式解决内部协调问题的方式不同，模式的差异植根于制度配置之中，具有制度互补性的制度框架赋予不同资本主义模式以差异化的比较制度优势和模式惯性。彼得·霍尔和大卫·索斯凯斯提供了一个以制度互补性概念为核心的比较政治经济理论框架，其核心内容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充满了多重制度的相互嵌套，相互匹配的各种制度之间存在功能互补性，共同决定了经济中的基本协调模式。<sup>②</sup> 由此，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隐含了一种制度路径依赖理论，由于制度配置内部的制度之间相互结合产生作用，某种资本主义模式的特性难以通过局部制度变革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资本主义模式

---

<sup>①</sup> Paul De Grauw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Euro,"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6, no. 1, 2013, pp. 153 - 170; Robert Boyer, "The Euro Crisis: Undetected by Conventional Economics, Favoured by Nationally Focused Polity,"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37, no. 3, 2013, pp. 533 - 569.

<sup>②</sup> Peter Hall and David Soskice, eds.,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9 - 21.

的基本协调模式具备惯性,进而,从比较维度上看,不同资本主义模式之间的差异难以轻易走向融合。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提供了一种比较制度优势分析方法,资本主义模式被视为支持某种系统性经济行动“逻辑”的制度组合,不同的制度互补性组合会为不同的优势经济行为提供制度环境支持,不同资本主义模式因此会对应不同的专业化分工。霍尔和索斯凯斯突出强调了自由资本主义和协调资本主义的区别,自由市场经济以市场交易的方式建立制度互补性,制度比较优势是对可转换资产的投资以及孕育突破式创新,而协调市场经济以博弈论式的战略协作的方式建立制度互补性,制度比较优势是对专用性资产的投资以及孕育渐进式创新。<sup>①</sup>

以霍尔和索斯凯斯为代表的第一代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提供了以制度互补性界定资本主义模式的基本视角,但其理论内核着眼于追求制度组合的功能匹配和最优效率,这种基于静态功能最优化的思路有其缺陷,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类型的理解局限于自由资本主义和协调资本主义的二分法,难以动态的考察现实世界中制度的起源和发展,也不利于理解为何无效率的制度会存在。为了克服这种静态化和片面化缺陷,第二代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通过与历史制度主义和演化思维的融合,将对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理解动态化,并强调了历史和政治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性。<sup>②</sup>对于考察欧元区发展失衡问题而言,理解现实世界中欧元区成员国的资本主义模式差异,考察欧元区成立后的动态发展分化,以及认识到欧元区在功能上存在缺陷至关重要,因此,需要第二代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更具历史感的视角。

引入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后,制度互补性研究更多的关注历史中形成的制度配置的真实情况,而非片面强调对效率的追求。与强调行为体自利和追求效率最大化的第一代理论不同,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行为体的行为是由经验中习得的,而

---

① Richard Deeg and Gregory Jackson, “Towards a More Dynamic Theory of Capitalist Variety,” *Socio-Economic Review*, vol. 5, no. 1, 2007, pp. 149 – 179.

② 代表性文献有: Peter A. Hall and Kathleen Thelen,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Socio-Economic Review*, vol. 7, no. 1, 2009, pp. 7 – 34; Kathleen Thelen,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rajectories of Liberalization and the New Politics of Social Solidarit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5, no. 1, 2012, pp. 137 – 159; Wolfgang Streeck, “Institutions in History: Bringing Capitalism Back In,” in Glenn Morgan, et al.,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659 – 686; Colin Crouch, *Capitalist Diversity and Change: Recombinant 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0 – 24.

制度的建立和维系依赖于分配性矛盾中形成的政治妥协。制度互补性并不一定会因对协调效率的追求而自动形成制度间的功能匹配，因为不同制度领域可能被不同政治联盟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克服政治联盟之间的冲突，寻求政治妥协才有可能实现制度互补性。<sup>①</sup> 协调问题的政治化着重于理解制度互补性体系的起源及其发展变革，资本主义模式的协调特征通常来自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政治妥协，决定了制度建立的基本导向和制度服务的对象，而制度功能问题需要在制度创设之后进行事后考察。应该从资本主义模式建立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关键节点着手，考察资本主义模式中主要体现出的系统协调原则。

在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制度互补性仍然是一个有用的概念，互补性能够帮助研究者超越单一制度研究的局限性，通过对经济不同领域制度之间如何相互联系的探究理解资本主义模式的内在逻辑。历史进程中的制度互补性并非出于对效率的追求，而是在多领域制度共同演化进程中产生的，是反复的试验和试错的结果，制度互补性通常是事后发现的而非由制度设计中得出的。<sup>②</sup> 现实世界中的制度之间很难做到完全契合，历史进程中可能形成或强或弱的制度互补性，因此，从历时性视角考察制度互补性真实的建立过程对于切实理解经验案例十分重要。

制度互补性视角提示研究者，不能以孤立的方式来考虑制度对整个经济的影响，而是要考量制度的共同影响。因此，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有助于理解为何欧元区国家引入了相同的货币制度，却产生非常不同的发展结果。欧元区成员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应视为一个连贯的整体，具有基于国家历史的独特特征，而不是同质化的市场。欧元区发展失衡的结构性原因在于货币联盟内部存在差异化的资本主义模式，不同资本主义模式的系统协调原则不同，并在内部具备不同的制度互补性框架，难以轻易走向趋同。制度互补性机制赋予了欧元区各类资本主义模式独特的模式惯性，由于国家政治经济中的多重制度领域互补性越强系统的协调功能就越好，这意味着制度互补性体系具有路径依赖倾向，不同的资本主义模式更倾向于与那些与政治经济中固有的协调能力相辅相成的货

---

<sup>①</sup> Wolfgang Streeck, "Requirements for a Useful Concept of Complementarity," in Colin Crouch, et al., "Dialogue on '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y and Political Economy'," *Socio-Economic Review*, vol. 3, no. 2, 2005, pp. 359–382.

<sup>②</sup> Robert Boyer, "Coherence, Diversity, and the Evolution of Capitalisms—The 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y Hypothesis," *Evolutionary &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Review*, vol. 2, no. 1, 2005, pp. 43–80.

币制度相匹配。<sup>①</sup>

欧元区带来的货币制度变革是货币制度领域的局部变革,不仅意味着超国家层面采取固定汇率并实行共同的货币政策,同时意味着各成员国国民经济制度配置的重大变革。在这一进程中,欧元和欧元区的货币制度取代了各国原有的货币体系,而与原有货币体系相互补的其他各种经济制度因此面临着调整的压力,欧元区以低通货膨胀为核心的中性货币制度需要与各国各具特色的制度互补性体系相适应。从欧元危机所反映出的结果看,欧元区货币制度扩大了成员国的初始差异。欧元区制度从一开始就塑造了一种不对称,不同资本主义模式中引入欧元区的货币政策所受到的冲击是不同的,原因在于,不同资本主义模式的国家在历史上形成的货币制度需求与欧元区制度匹配后产生的制度激励存在差异。<sup>②</sup>

### 三 欧元区的三种资本主义模式

资本主义多样性视角要求首先界定欧元区成员国的类型学特征,认识欧元区内不同资本主义模式的差异,最终服务于比较分析和互动分析。每种类型的建构都需要从资本主义模式奠基的关键历史节点着手,分析模式协调原则确立的政治经济背景,进而分析模式中的制度互补性,最后说明这一资本主义模式的货币制度需求。简而言之,欧元区内部存在北方的出口导向型资本主义模式、南欧的内需导向型资本主义模式和法国的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模式,三种资本主义模式在历史上形成了不同的货币制度需求,这构成了欧元区日后分化发展的关键因素。

#### (一) 北方出口导向型资本主义:长期主义协调与稳定性货币制度需求

欧元区北方的出口导向型资本主义是一种能够有效维系生产竞争力的资本主义模式。其核心特征是能够通过雇主联盟和工会等社会团体组织自下而上的谈判,协调和维系有效长期承诺,建立社会团体间战略合作关系,在提高生产力的社会共识基础上维持高质量多样化的生产体系,支撑出口导向制造业,促进经济

---

<sup>①</sup> Peter Hall and Daniel Gingerich,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and 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ie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An Empirical Analysi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9, no. 3, 2009, pp. 449-482.

<sup>②</sup> Wolfgang Streeck, "Why the Euro Divides Europe?", *New Left Review*, vol. 95, no. 5, 2015, pp. 5-26.

增长。这是一种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在市场运行无法保证平衡时，强大的雇主协会和工会有能力通过自组织的方式达成协调和稳定，因此公权力干预工具在经济运行中的实际作用是有限的，在货币制度方面偏爱稳定而非干预。德国是北方出口导向型资本主义具有代表性的案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联邦德国建立了独立于政治的中央银行，坚持低通胀为核心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上也存在紧缩主义传统。<sup>①</sup> 欧元区的货币政策框架主要是以德国货币治理模式为蓝本，强调欧洲中央银行独立和以低通货膨胀为核心目标，故而欧元区的货币政策与北方出口导向型资本主义国家更加匹配。

北方出口导向型资本主义的协调原则建立在秩序自由主义理念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之上。二战后，秩序自由主义理念成为引领德国经济秩序重塑的基础性理念，秩序自由主义认为自由经济和政治权威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经济自由源于国家的政治构建，自由放任无法促进和维持竞争性经济，需要切实和有组织的强制力量保障市场自由有效运行。与自由放任主义的弱国家理念不同，秩序自由主义理念主张以强大国家保障市场自由，认为市场需要一种社会政策来维持，这种政策促进自由和责任，提供道德框架来确保社会凝聚力，让公民具备自我负责的企业家精神。<sup>②</sup> 在秩序自由主义理念下，德国建立了社会市场经济，强调私有制和自由市场是实现稀缺资源优化配置和人类福祉最大化的最优手段，但自由经济的运行需要国家承担提供法律和秩序的责任，以及一个稳定的货币体系。<sup>③</sup> 为了保障货币稳定，德国政府的货币政策被赋予独立的联邦德国中央银行，这主要是吸取魏玛共和国时期政治动荡导致货币政策失控的教训，独立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不会因政治选举周期和社会运动的干预而发生大范围波动，联邦德国央行坚守低通货膨胀为准则的货币政策理念，保障货币稳定不受政局变化的影响，这一货币

---

① 联邦德国是西方阵营中的一个例外，二战后，西方国家占据主流的宏观经济治理方式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但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性宏观政策在德国仅存在了短暂的一个时期，在1966年为了解决经济衰退问题而引入，但政策效果不彰，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后，联邦德国结束了凯恩斯主义试验，并回归了稳定性危险的宏观经济政策。参见：Christopher S. Allen,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Keynesianism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in Peter A. Hall, ed., *The Political Power of Economic Ideas: Keynesianism across N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263–289.

② Werner Bonefeld, “Freedom and the Strong State: On German Ordoliberalism,”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17, no. 5, 2012, pp. 633–656.

③ Norman Barry, “The Social Market Economy,”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vol. 10, no. 2, 1993, pp. 1–25.

政策传统也成为欧元区建立谈判时德国提出的关键条件。

北方出口导向型资本主义最为重要的特征是雇主协会和工人组织等社会团体优秀的自组织能力,很多准公共物品是由社会团体协商谈判提供的,在筹集和分配资本、调动足够资源、发展技术创新和培育高水平技术工人方面都能够自发达成有效的协调,这成为生产竞争力的关键来源。社会团体之间广泛的协调合作基于一种长期主义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以质量竞争为基础的生产体系。团结的长期主义关系能够促进对于特定产业技术的持续专研,行业协会和工会都被深深地绑定在特定的产业中,只有其产品在同类型竞争中质量卓越才能够获得高水平利润,进而同时改善劳资双方的境遇。行业协会网络促进了先进技术在行业内的转移,长期雇佣使得工人愿意培养自身职业专用型技能从而形成精湛的生产技艺,这些因素相叠加促成了产品的高质量和优越的出口竞争力。<sup>①</sup>

北方出口导向型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互补性服务于维系社会团体间的长期战略关系,支撑高质量多样化生产。行业协会制度支持了企业间战略关系有助于行业标准的制定和技术转移并最终服务于高质量生产,银行根据企业在行业协会中所积累的声誉做出的战略性长期投资,长期投资保障了企业能够着眼于长远发展并做出对工人的长期雇佣承诺,长期雇佣关系下劳资谈判和工会参与公司治理塑造了按照技能水平决定的工资标准,这激励工人提高自身专用型技能,而完善的职业培训体系和学徒制使得工人提升技能的进程有路可循,最终劳资双方都能够高品质生产所塑造的质量竞争力中谋求共同利益并维系长期关系。对于在高质量多样化产业转型升级进程中被淘汰的产业工人和低技能工人,慷慨的福利国家制度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失业保险和提前退休等方法进行了适度的补偿,从而缓和了产业升级进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这些制度中,着眼于共同利益和长期关系的劳资谈判制度应该被视为制度互补性体系的核心,高度组织化的雇主协会和工会以战略协调取代了市场机制,促成了长期主义和质量竞争为主的生产方式,并与独立央行和低通货膨胀为特征的货币制度相辅相成。

北方出口导向型资本主义的货币制度服务于维系社会团体之间的长期关系,

---

<sup>①</sup> Wolfgang Streeck, "German Capitalism: Does It Exist? Can It Survive?",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2, no. 2, 1997, pp. 237 - 256; 郑春荣、姜文:《“德国模式”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及其所面临的挑战》,《国际论坛》2011年第6期,第52—57页。

其典型代表是德国，以独立中央银行推行低通货膨胀为核心的货币政策。德国央行的技术官僚掌控着货币政策，独立于选举政治波动和政府政策干预，在长周期中建立了低通货膨胀政策的声誉。可信的低通货膨胀政策降低了劳资双方达成工资合意的交易成本，由于不存在货币政策扩张引发的通货膨胀，所以不必担心名义工资的实际购买力下降，这意味着工会方面没有必要因通货膨胀预期而在工资谈判进程中追求过高的名义工资增幅，由此，工会将更大的精力放在争取高就业率、保障工作条件和提高培训质量方面，而能够以有确定性的方式控制工资成本也有益于雇主方的经营管理。<sup>①</sup> 独立央行的低通货膨胀政策助力了德国劳资谈判制度的顺利运行，对于提高德国生产竞争力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

汇率方面，德国基于低通货膨胀政策和强大的工业竞争力，建立了一种非操控性的汇率政策模式。一方面，非操控性汇率是低通货膨胀为核心货币政策的副产品，为了保持国内低通货膨胀，德国需要减少汇率干预行为，因为如果中央银行为了干预汇率买入外汇，其资产负债表会自动扩张，而这种扩张会导致德国国内通货膨胀，故而干预性的货币政策与德国的低通货膨胀追求相矛盾，没有成为德国的选择。另一方面，德国以质量竞争为主的出口行业不需要通过贬值来争取市场，强大的出口竞争力帮助联邦德国在 1971 年实行浮动汇率制后成功推动了马克的国际化。在需求端，德国高端制造业凭借其质量竞争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建立了卖方市场优势，消费者对德国商品具有依赖性，因此，德国不需要使用汇率贬值措施来促进价格竞争。在供给端，凭借产业链高端的优势形成了对整个产业链的控制力。需求端和供给端双重优势使得联邦德国的议价能力很强，凭借这种议价能力优势，德国拥有了在本国进出口贸易中选择计价和结算货币的权力，20 世纪 80—90 年代，联邦德国出口产品以马克计价的比例在 80% 左右波动，德国马克也借此成功跻身第二大国际货币地位。<sup>②</sup>

国际层次，低通货膨胀货币政策为联邦德国马克赢得了良好的货币信誉，国际市场对于德国中央银行的行为有稳定的预期，也因此更愿意使用马克。在欧洲范围内，伴随着德国马克世界货币地位的提升，马克成为欧元诞生前欧洲汇率机制事

<sup>①</sup> Peter A. Hall and Robert J. Franzese, "Mixed Signals: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Coordinated Wage Bargaining and European Monetary Un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3, 1998, pp. 505–535.

<sup>②</sup> 赵柯：《工业竞争力、资本账户开放与货币国际化——德国马克的国际化为什么比日元成功》，《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年第 12 期，第 140—155 页。

实上的锚货币，法国和意大利等国都将本国货币与马克之间建立盯住关系，由此减少欧洲伙伴国家之间的汇率波动并像国际资本市场证明自身货币的稳健性。这种盯住关系赋予了德国国际货币权力优势，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中央银行不得不跟进德国中央银行的政策，但德国没有义务对这些钉住国负责。这种不平衡的关系激起了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政治反弹，谋求推进欧洲货币一体化以平衡德国的国际货币权力，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德国为代表的欧元区北方出口导向型资本主义以高度组织化的劳资协调制度为核心特征，具备服务于高质量多样化生产的制度互补性，偏好独立央行推行的低通货膨胀政策，且在汇率问题上奉行不操控策略。欧元区的货币制度主要是移植了德国央行的货币治理模式，这意味着欧元区建立过程中，欧元区北方国家在超国家制度层次移植了与自身资本主义模式相匹配的货币制度。

## （二）南欧的内需导向型资本主义：庇护主义协调与干预性货币制度需求

与北方出口导向型资本主义不同，南欧资本主义中庇护主义协调方式盛行，造成生产竞争力不足，不得不奉行以内需导向性经济发展方式为基础，并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干预性的货币制度。

庇护主义协调方式的突出特征是庇护者（The Patron）向其依附者（The Client）提供排他性的利益换取后者的支持和合作，政治上常见的例子是庇护者提供独家福利换取依附者的选票。<sup>①</sup> 为维系庇护者和支持者之间小范围互惠关系，社会团体需要为自身争取更多的利益，但在增进政治经济体系的总体福利方面缺乏合作性。南欧国家资本主义中存在一种不良激励，由于市场机制和国家政令在资源分配领域都要受到庇护关系的制约，社会团体之间的互动并不以谋求建立合作和长期承诺为标的，而是着力于争取公权力提供的保护和补偿。不同庇护主义团体之间分配性矛盾纷繁复杂，众多的否决者团体妨碍了长期合作承诺的达成，因此，无法像欧元区北方出口导向资本主义那样建立高质量生产的共识。企业主更加注重从官方获得资源倾斜而不是研发高质量产品，工会注重维护工人长期就业但并不能够与企业主合作培训高技能工人，由于公共资源分配的争夺激烈，更易出现政客向选民过分承诺而造成的公共财政透支问题。由此，南欧资本主义国

---

<sup>①</sup> Uwe Becker, *Open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Continuity, Change and Performance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p. 59 - 60.

家形成了以中等质量产品为主的生产结构，技术密集度低、产品市场监管繁重、对企业家精神和新技术尤其不利。<sup>①</sup> 生产竞争力的缺失使得南欧国家无法以出口盈余支撑经济体系运转，由此，促进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这导致南欧国家更加需要干预性的货币制度，以干预性政策刺激适度的通货膨胀，调控经济的运行。

南欧以庇护主义为特征的协调方式有其历史和政治根源。二战后的南欧国家具备一些显著的共同特征，它们是工业化进程的后来者、存在法西斯时代残留的强国国家特征和天主教传统影响下的社会生活，这是理解其资本主义模式的三个关键焦点。从生产结构上看，南欧国家属于工业化的后来者，工业竞争力总体而言处于弱势，需要一定的国家干预来带动经济发展。南欧国家在二战前普遍走向了法西斯主义政权组织模式，而二战后并没有经历德国和日本那种程度的根本性的改造措施，其强国国家传统没有受到伤筋动骨的冲击，官僚主义和裙带关系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保留。二战后，面对美国推动的自由民主运动和工人阶级推动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南欧国家的保守力量在天主教提供的传统社会纽带下凝聚，形成了基督教民主主义力量，倡导传统社会纽带对于抗击自由市场冲击和工人运动挑战的重要意义。<sup>②</sup> 强国家官僚主义裙带关系、碎片化的工会运动和基于传统宗教纽带的基督教民主力量都具备较强的内部人控制特征，内部人控制为根基的制度环境为南欧资本主义中庇护主义团体盛行提供了温床。

欧元区北方国家和南欧成员国都以社会团体为单位协调生产和分配问题，但南欧社会团体呈现出显著的碎片化特征，社会团体自组织能力不足，这导致南欧国家的政府承担了更多的协调责任。南欧国家的社会团体存在公立和私营经济之间、不同技能水平行业之间、大公司和小公司之间纷繁复杂的分化，这造成了自组织协调的困境，碎片化的社会组织往往有能力对协调议题行使否决权，但是，自下而上达成有效集体行动和维系长期承诺的能力不足。鉴于社会团体之间的合

---

① Óscar Molina and Martin Rhod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djustment in Mixed Market Economies: A Study of Spain and Italy," in Bob Hancké, et al., eds., *Beyond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Conflict, Contradictions, and Complementarities in the European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23 - 252.

② Giovanni Arrighi, "Fascism to Democratic Socialism: Logic and Limits of a Transition," in Giovanni Arrighi, ed., *Semiperipheral Development: The Politics of Southern Europ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85, pp. 243 - 279.

作能力不足而政治冲突频繁,南欧资本主义模式中国家在宏观上承担更多的协调任务,政治经济体系的稳定是建立在国家干预的基础之上的,在国家协调进程中正式规则的作用往往是次要的,国家经常进行务实权变的组织政治交易是其突出特征。

奥斯卡·莫利纳和马丁·罗兹对南欧资本主义模式进行了经典的总结。第一,自组织能力不足的社会经济利益集团行使强大的否决权,限制了对专用资产投资,在生产和社会生活中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协调失灵。第二,由于协调失灵往往是由国家干预来应付的,由此调整过程取决于国家的把关作用。第三,尽管对专用资产投资的激励有限,但有强烈的动机投资政治权力资产,围绕各个政党及其附属组织形成了强大的庇护关系和裙带关系网络。第四,国家在纠正协调失灵方面发挥作用时,往往需要满足利益组织要求的“补偿”(补贴、保护)以换取合作,国家协调有的时候也会因为谈不拢而被颠覆。<sup>①</sup>利益集团碎片化和协调进程政治化造成社会团体自组织能力不足,使得国家干预在生产和分配方面都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这种政治格局决定了南欧资本主义系统协调原则中突出的庇护主义特征。

南欧资本主义的主要制度配置组合围绕庇护主义形成了特定的互补关系,国家调控是帮助企业应对危机和战略发展的关键枢纽;公司治理制度表现为国有企业和家族企业中的金字塔式内部人控制治理,国有部门和大型家族企业之间存在裙带关系网络,企业依靠国家庇护创业;社会福利制度显著不平衡,就业保护偏向于有正式合同的壮年男子,造成福利分配不平衡和劳动力市场碎片化;教育和培训系统有欠发展,没有足够多的高技能劳动力。这种制度配置组合在引领资本和资源相对匮乏的南欧国家实现初步工业化方面取得过一定的成绩,但却不利于进一步向技术创新和高资本密集度的知识经济转型。南欧资本主义缺乏有利于先进产业升级的正向反馈机制,福利制度通常社会保护较少,就业保护较多,社会保护水平低导致劳动力没有长期稳定预期,阻碍了劳动者坚持特定技能训练的动力,而低技能水平反过来又妨碍参与高技术活动。在生产领域,产品市场高度管制和国家干预造成了稳定的银行—行业关系,并限制金融市场的增长,竞争压力被人为地压制了,这导致企业经营者优先争取庇护资源而不是努力提升企业竞争

---

<sup>①</sup> Óscar Molina and Martin Rhod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djustment in Mixed Market Economies: A Study of Spain and Italy,” pp. 223 – 252.

力。所有这些特点共同形成了一种工业专业化格局，其基础主要是一般工业制成品而非高质量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只能进行价格竞争，并严重限制了经济向高工资/高技能发展道路的转移。<sup>①</sup>

货币制度偏好方面，由于产品国际竞争力的不足，南欧资本主义国家偏好高通胀刺激内需发展的模式，并辅之以周期性的名义汇率贬值来平衡通货膨胀政策造成的出口竞争力下降。南欧资本主义国家商品的出口竞争力有限，除高端生活消费品和定制手工奢侈品外，其工业产品只能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价格竞争，出口得来的利益无法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有效支柱。在这种情况下，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凸显，其宏观政治经济制度偏向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促进国内需求的财政政策立场。因此，南欧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凯恩斯主义政策，以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来抑制储蓄增进内需。这一发展战略由国家干预推动，也得到了重要的政治联盟的支持，工会有动力争取国家财政赤字提升工资，国有银行经常推动政府使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并批复更大的贷款额度，政府也惯于通过大量发放新债稀释旧债务的偿债压力。内需推动的发展模式的一个副作用是会推动通货膨胀上涨，从而造成出口产品价格竞争力的进一步下滑，为此南欧内需导向型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周期式的贬值恢复自身中等质量商品在国际上的价格竞争力。<sup>②</sup>

在加入欧元区之时，南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精英普遍认为这种依靠国家宏观干预推动内需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并着力于通过加入欧洲统一大市场 and 共同货币区来引导国家走向与市场自由主义模式。但是，这种转型追求忽视了资本主义模式的惯性，过于简单地认为其他国家的成功能够顺利地复制在自己国家土地上。南欧内需导向型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庇护主义裙带关系决定了以个体竞争、明文契约和公平交易为核心的市场自由主义难以顺利复制，而缺乏产业出口竞争力使得南欧国家不得不继续依靠以内需为动力的发展模式，在这一背景下，加入欧元区意味着货币政策工具自主性的丢失。南欧国家失去了扩张性货币政策工具、以主权信用担保国家债务的能力以及贬值来保障出口竞争力的能力，庇护主义政治所造成的宏观经济压力被全面转移到财政领域，这是这些国家日后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的祸根所在。

① Bruno Amable, *The Diversity of Modern Capit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13.

② Alison Johnston and Aidan Regan, "European Monetary Integration and the Incompatibility of National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54, no. 2, 2016, pp. 318 - 336.

### (三) 法国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模式的转型与货币政策偏好的波动

在欧元区创设和欧元危机后的制度重塑两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法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政治作用,是德国在谈判桌前最重要的博弈对象,因此,对法国资本主义的考察不可或缺。但是,相对于北部出口导向型资本主义和南欧内需导向型资本主义,法国资本主义模式问题有其特殊的复杂性。原因在于以1968年革命为界,法国资本主义模式出现过一次影响重大但又并不彻底的制度变革,二战后建立的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难以为继,而新的自由化改革总是处于被动探索之中。由于自由化制度变革并不彻底,这导致法国的资本主义模式呈现出某种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也影响到了货币制度领域,影响了法国在欧元区创设、发展和危机治理中对于欧元区货币制度的立场。

法国在二战后建立了一种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模式,经济发展经历了成绩斐然的“光荣三十年”(Trente Glorieuses),从一个农业人口占比高、技术能力相对薄弱的封闭经济体成功转型,实现了稳定而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工业化。这些成绩主要源于法国“现代主义者”推动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现代主义者”认为实现工业化需要政府集权和政府干预,突破二战前法国以小农社会和家长制企业为主的旧模式。<sup>①</sup> 二战使法国保守势力元气大伤,以让·莫内(Jean Monnet)和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为代表的法国官僚集团抓住这一时机推动了“现代主义”政策,初步建立起了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模式。此后的第四共和国时期,通过加强计划委员会和国库署等行政机器的权力,法国政府对外控制“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资源,对内建立支配型的国家干预力量,引导法国产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第五共和国时期戴高乐政府进一步加强总统权力后仍然坚持“现代主义”政策,在20世纪60年代对“国家冠军”企业进行大量补贴。总而言之,国家直接干预为法国带来了二战后长达三十年的经济繁荣。<sup>②</sup>

法国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时代的主旋律是中央集权,国家对公司治理与金

---

<sup>①</sup> Bruno Amable, *Structural Crisi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Modern Capitalism: French Capitalism in Trans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62-67.

<sup>②</sup> 约翰·齐斯曼:《政府、市场与增长——金融体系与产业变迁的政治》,刘娟凤、刘骥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107—116、156—160页。

融、劳资谈判和教育三个关键制度具有强力控制。首先，在公司治理与金融领域，法国政府直接控制了很多国有企业，并建立了指示性计划政策和信贷分配制度，这形成了法国国有企业占比高和内部人控制现象突出的特征。其次，在产业政策领域，在法国家长制企业传统影响下，行业协会和工会都具有弱势和分裂的特征，这为法国政府主导劳资关系建设提供了契机。法国政府通过国有化成了法国最大的雇主，掌握最低工资政策并有能力将局部集体谈判的成果全国化，由此，法国建立了以政府主导为核心的劳资集体谈判模式。最后，法国政府通过公立教育制度对教育培训领域进行控制，出身名校的治国精英自学生时代起就处于名校师生构成的精英网络之中，经过竞争性考试制度遴选可以进一步成为治国精英。同时，公立教育制度的推广为法国产业发展培养了充足的合格劳动力，助力了产业的现代化转型。<sup>①</sup>

在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同时，中央集权模式也孕育了不容忽视的矛盾，由于中央集权政府在经济资源配置中的中心地位，政治运作能力成为法国产业竞争中的关键一环，法国企业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争取国家补贴而非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市场竞争力。与此同时，国有企业空降官员现象严重，而且通过精英院校的教育遴选的官僚未必真的懂得经营。<sup>②</sup> 种种原因造成法国资本主义内部存在一系列功能失调，工业品的质量始终维持在中等层次，因此，对于国际市场价格波动更加敏感，法国经济更易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冲击。当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陷入停滞之时，法国成为最早一批陷于大量失业和政治动乱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1968年的“五月风暴”重创了法国中央政府的权威，导致次年戴高乐黯然辞职，并宣告了左派政治势力的强势崛起。接任戴高乐的蓬皮杜政府大致延续了国家干预主义传统，但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国家干预主义已经无法继续主导法国的经济发展。在法国参与欧元区创设的进程中，国内政治精英的核心议题是如何从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模式中走出来，其主旋律是怀疑国家计划，抛弃凯恩斯主义，走向保守自由主义和“竞争性通货紧缩”政策。

---

① Pepper D. Culpepper, “Capitalism, Coordination, and Economic Change: the French Political Economy since 1985,” in Pepper D. Culpepper, et al., eds., *Changing France: The Politics that Markets Mak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 29–49.

② Jonah D. Levy, “From the Dirigiste State to the Social Anaesthesia State: French Economic Policy in the Longue Dure,” *Modern & Contemporary France*, vol. 16, no. 4, 2008, pp. 417–435.

1974年上台的德斯坦政府开启了法国改革,在上台初期德斯坦政府尝试依据传统凯恩斯主义干预政策采取的工业补贴、控制通胀和稳定就业的措施,但并没有挽救法国经济,面对日益严峻的赤字和法郎贬值问题,具有保守自由主义倾向的德斯坦总统最终决定从更加根本的制度框架入手,转变法国资本主义的运行模式。<sup>①</sup>

法国政坛中保守自由主义理念认为,如果要重塑法国经济的竞争力,需要让经济行为体暴露在严酷的市场竞争中得到筛选,为此,法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推行“竞争性通货紧缩”政策。在法国保守自由主义者看来,凯恩斯主义以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增长的路径只会使法国经济陷于“通胀—危机—贬值”的恶性循环,而如果希望扭转经济困境并向有竞争力的产业结构转型,就需要控制通货膨胀,谋求稳定的宏观经济治理框架。保守自由主义的“竞争性通货紧缩”政策强调稳定导向的宏观经济政策,认为国家应该在适度通货紧缩的基础上维护财政纪律,实现国际收支平衡、预算平衡以及消费和储蓄平衡,而稳定的法郎对建立基于尊重储蓄和货币稳定的社会秩序是不可或缺的。为此,1976年,德斯坦总统任命雷蒙德·巴尔为法国总理,9月开始推行“巴尔计划”,采纳货币主义思想,稳定货币供应控制通货膨胀,同时,将法郎稳定视为巩固和加强法国经济中最有生产力和竞争力的部门的一种手段。<sup>②</sup> 1981年选举中,法国二战后第一个左派政府诞生,密特朗在执政初期(1981—1983年)曾尝试逆转自由主义趋势,推行民主社会主义、国有化和宏观经济扩张,但是这些政策并没有恢复法国的投资和经济增长,反而因此制造了大量的赤字并加大了法郎的贬值压力,密特朗政府被迫于1983年选择借助欧洲货币体系(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EMS)和金融自由化政策缓解困境。<sup>③</sup> 1986年选举“密特朗—

---

① 德斯坦总统主张,政府不应进行价格控制和设定最低工资,不应直接参与生产活动,不应参与国际贸易和汇率市场进行干预,因为这些行为都会造成效率的损失,政府经济政策的重心应该是设定可预期的稳定的货币政策、减少支出与赤字、防止有碍经济增长的增税、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等长期问题和创造有利于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参见 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The Role of Governments in Economic Affairs,”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vol. 3, no. 2, 1985, pp. 61–66.

② Kenneth Dyson and Kevin Featherstone, *The Road to Maastricht: Negotiating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76–86.

③ Peter A. Hall, “The Evolution of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in Europe,” in Bob Hancké, et al., eds., *Beyond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Conflict, Contradictions, and Complementarities in the European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39–84.

希拉克”左右共治政府建立，公开支持新自由主义的雅克·希拉克的加入进一步增加了自由主义在法国改革进程中的影响力。<sup>①</sup>

20世纪90年代，自由化在法国资本主义中继续发展。大规模私有化改变了国家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改变了国家与私营部门的关系。法国大公司从事跨国并购、外国子公司收购和国际合资经营，法国资本主义的国际化进程加快。受法国公司海外收购的推动，法国公司受到股权融资程度影响加强，英国和美国机构投资者股权持有量急剧上升，法国股权掌握在外国手中的程度已成为法国资本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资本市场改革，特别是公司债券市场改革，创造了一个更多由市场提供资金的经济，到了21世纪初法国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已经成熟，而国家和银行已经逐渐不再发挥它们以前在法国企业资本主义融资中的核心作用。<sup>②</sup>

法国资本主义模式的自由化变革影响到了法国在欧元区创设和发展进程中的货币制度偏好。20世纪60—80年代，法国主要的货币制度偏好体现了国家主导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谋求建立干预性的“欧洲经济政府”，认为欧洲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该考虑成员国政治诉求，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法国对于让渡法国的货币主权持一种保守立场。<sup>③</sup>但是，20世纪80年代，法国政治精英们已经意识到一个新的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国际金融市场和欧洲汇率机制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如果法国固守此前的民族主义经济外交立场很可能导致法国在新的时代陷于孤立。由于密特朗时期特定的自由化改革追求，政府中的改革派将欧洲货币联盟带来的制度变革压力视为一种促进自由化的外部约束，认为通过融入国际金融市场和进一步推进欧洲货币一体化，可以确保法国政府能够保障货币稳定目标的有效实施。<sup>④</sup>法国自由化改革所强调的严格预算纪律、保持货币稳定

---

① 法国改革进程参见：Bruno Amable, et al., “Changing French capitalism: Political and Systemic Crises in France,”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19, no. 8, 2012, pp. 1168–1187.

② Ben Clift, “French Responses to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st-Dirigisme and New State Activism,” in Wyn Grant and Graham K. Wilson, eds.,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e Rhetoric of Reform and Regul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06–225.

③ 朱宇方：《欧洲经济政府？解析欧洲货币联盟经济治理机制的德法之争》，《德国研究》2011年第4期，第21—26页。

④ David Howarth, “The French State in the Euro-Zone: ‘Modernization’ and Legitimizing Dirigisme,” in Kenneth Dyson, ed., *European States and the Euro: Europeanization, Variation and Converg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45–172; Kenneth Dyson and Kevin Featherstone, *The Road to Maastricht: Negotiating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pp. 77–89.

和尊重外部约束三项关键理念对于法国在欧洲货币联盟谈判中的立场存在深刻的影响,使得法国有更大的空间脱离此前强调的“欧洲经济政府”主张,在坚持追求欧洲货币政治领导权的同时,能够接受一个由经济技术专家主导、脱离政治约束与监督的独立的欧洲中央银行,为德法妥协提供了可能性。

在欧元区危机后,法国重新谋求推行其“欧洲经济政府”主张,这一转变的原因是法国资本主义的自由化变革并不彻底,危机后出现了向强国家传统的回归。20世纪70年代开启的一系列改革向法国资本主义中增加了自由化成分,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国资本主义已经完全倒向了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国家主导资本主义时代留存的强国家特征仍然存在惯性。特别是欧元危机爆发后,法国受到的经济冲击得到了良好的控制,萨科齐政府对金融危机予以了积极的回应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法国经济所受到的冲击有限。危机治理进程中,法国国家官僚集团和银行业之间的纽带发挥了至为关键的协调作用,这体现出尽管法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入自由化改革,但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的遗存仍然牢固,法国政府对经济的影响水平仍然强劲。<sup>①</sup>当欧元危机爆发后,法国再次看到了增加自身在欧元区影响力的历史机遇,并着力推进“欧洲经济政府”建设,联合南欧国家突破德国秩序自由主义所设置的规范框架,在建立欧元区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发行风险共担的欧元区债券、在欧元区推行刺激增长的经济政策方面增加法国的影响,提升自身在欧元区的领导力。

#### 四 欧洲货币联盟的创设:不同货币制度传统问题为何被忽视?

如上文所述,欧元区存在三种资本主义模式,每种资本主义模式对应不同的货币制度需求。这些货币制度需求与资本主义模式具有内在的匹配性。欧元区以德国货币制度模式为蓝图,采用了独立欧洲中央银行、推行物价稳定为核心的货币政策,这意味着欧元区货币制度与北方出口导向型国家更加匹配,而与法国和南欧国家的干预性货币制度存在显著差异。由此,诞生了一个问题,为何欧元区主要移植了德国的货币制度?为何法国和南欧国家接受了这种制度安排?简而言

---

<sup>①</sup> Nicolas Jabko and Elsa Massoc, “French Capitalism Under Stress: How Nicolas Sarkozy Rescued the Bank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9, no. 4, 2012. pp. 562 – 585.

之，欧元区创设时期特殊的历史环境造成了这种结果，德国国内对自身货币制度内核高度坚持，而法国和南欧国家都处于谋求自由化改革的特殊历史阶段，在这种历史环境下，他们同意了以德国货币制度为内核的方案。

20世纪80年代的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可以看作欧洲货币体系内平衡德国国际货币权力的努力，以法国和意大利为代表的钉住马克的国家存在共同的政治经济诉求。<sup>①</sup>1979年建立的欧洲货币体系希望通过在欧洲范围内汇率合作，谋求在浮动汇率制时代实现欧洲国家之间的稳定汇率。在实现这一目的进程中，联邦德国马克凭借其稳定性逐步成了稳定欧洲汇率机制的锚货币，欧洲汇率机制事实上成了一个“马克区”，盯住马克的国家需要跟随德国中央银行的政策调整自身政策，而德国中央银行却并不需要对外国负责。以法国和意大利为代表的钉住马克的国家并不甘心于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希望通过推进货币一体化，用超国家机构的权威取代德国的国际货币权力。

德国内部对于是否加入欧洲货币一体化存在严重的分歧。德国外交部和联邦总理办公室外交司的官员出于政治目的赞成德国积极参与欧洲货币一体化，认为这是保障欧洲一体化战略不可逆转的必要一环，而德国央行、财政部和主流公众舆论都不愿意和南欧国家共同加入货币区，南欧国家被视为缺乏财政纪律和货币稳定性的经济体，其经济体系与德国的稳定文化格格不入。德国总理科尔执政期间出于政治目的，坚持积极的拥抱货币一体化，以此向欧洲盟友证明德国是西方国际社会可信赖的盟友，但科尔政府也需要安抚国内反对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力量。面对这种局面，德国科尔政府一方面与法国密特朗政府紧密合作，寻找推进货币一体化经济进程和提高货币一体化司法地位的突破口。<sup>②</sup>但另一方面，科尔和欧洲盟友说明，如果货币一体化谈判没有满足德国国内重视的先决条件，国际谈判的成果将被德国国内政治否决。1988年上半年德国担任欧洲共同体主席国期间，科尔政府密集发布了一系列倡议，明确德国对于货币联

---

<sup>①</sup> 需要说明的是英国也是欧元区创设谈判的参与方，提出了与德、法相竞争的方案，但最终没有加入欧元区。英国在谈判期间的表现与欧元区资本主义兼容性问题无涉，故而这一部分没有涉及英国的相关内容。

<sup>②</sup> 在柏林墙倒塌前，德法两国通过促成《单一欧洲法案》、支持德洛尔委员会建立、签订《巴塞尔协议》等方面步步为营的合作，已经为欧洲货币联盟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柏林墙倒塌后，科尔政府在1989年12月斯特拉斯堡会议上宣称愿意通过建立货币联盟展现新统一德国与欧洲盟友命运与共的诚意，德国法国共同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谈判制订了严格的时间节点，科尔以先斩后奏的方式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这都展示了科尔政府推进欧洲货币一体化的积极性。

盟的偏好,这些偏好包括:价格稳定、独立中央银行、促进增长等,这些表态明确了德国加入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底线性条件,如果欧洲盟友不接受德国内核的货币制度则欧洲货币联盟无从建立。<sup>①</sup>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谈判进程中,德国进一步明确加入货币联盟的“趋同标准”,坚持将“不纾困”条款写入条约,并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后进一步推进1997年《稳定与增长公约》的签订,这些都代表了德国在保证欧洲货币联盟以德国偏好的稳定文化为治理内核的努力。

在法国和南欧的改革派政治精英看来,欧洲货币联盟制度框架提供了推进自由主义改革的机遇,中央银行独立性和财政限制条件被这些改革家用来扭转二战后的凯恩斯主义强国家传统,意图借机推进本国转向弱政府模式,以市场为基础谋求长期稳定,推进供给侧改革、放松管制和私有化。20世纪80年代后,法国一直在谋求对自身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模式的改革,对于借助欧洲货币联盟的力量提供外部约束将自身宏观经济制度模式向稳定文化方向牵引,符合法国当时的国内改革意图。<sup>②</sup>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意大利正处于内政动荡时期,参与欧洲货币一体化被视为促成国内自由化改革的重要途径,被意大利金融从业者和收租金者用以对抗国有企业和家族企业。<sup>③</sup>1992年发生的“贿赂之都”裙带弊案使意大利政坛重新洗牌,基督教民主主义阵营崩溃,左翼自由主义政党上台。意大利左翼自由主义政党主张打击意大利资本主义的传统寡头政治,代之以竞争性的现代自由市场秩序,着重围绕大规模私有化、重塑劳资关系和加入欧元区展开改革。<sup>④</sup>1992年里拉危机后,加入欧元区被普罗迪政府视为扭转意大利货币弱势地位的关键一步,不惜征收“欧元税”来促成对欧元区“趋同标准”的达标。其它南欧国家方面,货币一体化被视为融入欧洲现代文明的机遇,结束弗

---

① Kenneth Duson and Lucia Quaglia, *European Economic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Commentary on Key Historical and Institutional Documen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341–344.

② David Howarth, “France: The Political Management of Paradoxical Interests,” in Kenneth Dyson, ed., *The Euro at 10: Europeanization, Power and Converg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11–131.

③ Bruno Amable, Elvire Guillaud and Stefano Palombarini,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eo-Liberalism in Italy and France,” CES Working Papers, HAL ID: halshs-00639450, <https://halshs.archives-ouvertes.fr/halshs-00639450/document>.

④ Richard Deeg, “Remaking Italian Capitalism? The Politic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Reform,”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28, no. 3, 2005, pp. 521–548; Pier Paolo Giglioli, “Political Corruption and the Media: The Tangentopoli Affair,”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vol. 48, no. 3, 2010, pp. 381–394.

朗哥时代不久的西班牙、殖民时代结束后谋求发展方式转变的葡萄牙和缺乏经济现代化经验的希腊都将进一步融入欧洲视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机遇，并积极加入欧元区。

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能够达成，特别是能够在违背法国和南欧国家的干预性宏观经济政策传统的情况下达成，还存在一系列进程性因素，导致各国资本主义差异没有被充分传导到货币联盟的谈判进程之中。

首先，20世纪80—90年代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谈判具有显著的“精英政治”色彩，国内部门利益被排除在谈判之外。欧洲货币一体化谈判被设定为一种由高级政府官员参与的“高级政治”，参与欧洲货币联盟谈判的各国的谈判团队大体相似，主要由财政部、外交部、总理府和中央银行官员组成，而国内充当部门利益发起者的部委，特别是那些负责工业、就业和社会政策的部委，与欧洲货币联盟谈判保持着距离，这导致了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的缺失，对货币制度与其他领域经济制度之间的匹配问题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sup>①</sup> 法国领导人密特朗和德国领导人科尔之间深刻的私人默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柏林墙倒塌之前，法、德两国主导的欧洲汇率机制改革和货币联盟设计蓝图问题已经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步。

其次，德洛尔委员会的经济技术专家主导了货币联盟蓝图的制定，在经济技术专家团体内，货币主义宏观经济理论是广泛的共识，保障了新的货币一体化方案能够顺利达成。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界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认知范式变革，货币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这一场变革在欧元区建立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欧洲政府普遍经历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失利，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促进就业的努力失败，随之而来的经济滞胀和政治危机迫使各国政府不再信任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理论以货币中性论为起点，倡导货币稳定目标对于结束经济滞胀、恢复健康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意义，实践方面，美英新自由主义改革和德国的货币治理模式共同确立了以稳定为核心的宏观政策范式的标杆地位。在石油危机后欧洲各国因滞胀问题焦头烂额之际，联邦德国凭借约束性的货币政策在一众邻国中脱颖而出，德国马克也因其稳定性而成为欧洲汇率机制锚货币的最优选择，法国总统德斯坦和密特朗先后以德

---

<sup>①</sup> Kenneth Dyson and Kevin Featherstone, *The Road to Maastricht: Negotiating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pp. 13 - 14.

国模式为改革方向，促成了欧洲政治精英模仿德国的风潮。<sup>①</sup> 当参与德洛尔委员会讨论的各国央行行长和经济专家就欧洲货币联盟应有蓝图进行讨论时，货币主义理念和德国货币治理模式成了共同接受的讨论基础。德洛尔委员会着重强调了货币一体化与《单一欧洲法案》所确立的欧洲统一大市场建设在逻辑上的继承关系，货币一体化的目标被明确设定为设立一个单一货币，这一单一货币由独立于政治权力干预的欧洲中央银行负责，财政联盟问题的重要性被边缘化，这一系列的主张都体现了欧共体国家央行行长和经济专家阶层对于货币主义理念的广泛共识。货币主义理念支持了对共同货币的乐观预期，签约国都积极地进行对内改革力求顺利搭上货币联盟的顺风车，不同资本主义模式转型成本和对欧元区的适应力不同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欧洲政治精英的充分重视。

最后，货币一体化进程是套嵌在一系列重大的地缘政治变迁进程之中加以推进的，柏林墙倒塌后欧洲紧迫的政治形势使得各国没有继续纠缠于经济方案的细枝末节。1989年11月民主德国宣布柏林墙开放，开启了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历史性的统一进程，也将欧洲地缘政治带到了选择的十字路口。新统一的德国唤醒了欧洲人对于两次世界大战策源地的恐惧记忆，欧洲盟友希望德国能够提供地缘安全方面的长期承诺。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经济和货币联盟建设具备了更强的地缘政治意义。1989年12月斯特拉斯堡会议上，德国向欧洲盟友承诺愿意通过加强欧洲一体化来化解欧洲邻国对于欧洲和平的担忧。由此，欧洲货币联盟谈判从纯粹的经济一体化问题上升为重塑冷战后欧洲大陆地缘政治格局的战略问题，各国都充满了尽快达成谈判协议的紧迫感。法德之间相互做出了妥协，欧元区呈现出一种“法国主导，德国内核”的特征。在战略发展方向上，法国“先实现货币统一，后谋求经济实质趋同”的方案占据了主导，而在欧元区的治理范式选择上，德国成功地将自身秩序自由主义的经济范式上传到了欧元区，包括与德国传统金融治理模式相一致的独立中央银行和以物价稳定为核心目标的货币政策范式，将欧洲央行选址于德国法兰克福，以及条约101项条款规定的“不纾困”原则等。“不纾困”原则否认欧洲中央银行具有“最后贷款人”功能，否认欧元区盟友之间负有在危机时刻相互援助的义务，其本意是防止道德风险，约东南欧地区公共财政纪律声誉不佳的成员国，但却成为日后欧元区危机治理缺乏有效工

<sup>①</sup> Kathleen R. McNamara, *The Currency of Idea: Monetary Politics in the European Union*,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63 - 71.

具的关键因素。

对于欧元区成员国的各国而言，共同货币能够显著提高欧洲统一大市场的经济效率，欧元的采用使得欧元区成员国之间不再需要面对货币兑换所产生的交易成本，杜绝了汇率波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统一大市场中的商品定价因统一货币而变得更为透明，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提高也有助于欧元区经济的发展。<sup>①</sup> 汇率稳定的单一货币首先得到了欧洲大公司和银行业的支持，这些强大的商业集团从中看到了发展跨国业务谋求更多经济收益的契机。在设计这一进程的经济技术专家看来，每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可以被视为同质的，因此，长周期中自由主义的政策可以在不同国家取得相同的绩效。这种思维方式低估了资本主义模式转换的难度，欧元区成员国资本主义模式存在异质性，且每种资本主义模式都具备独特的惯性，忽视了这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为欧元区此后出现南北发展轨迹分化和严重的不平衡问题埋下了隐患。

## 五 欧元区稳定十年（1999—2009）的 竞争力失衡与金融风险累积

欧元区的创设者们曾经预期低通胀和货币稳定有利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市场最终会引导欧元区成员国在生产率、生活水平和宏观经济表现的逐步趋同。从1999年1月1日欧元引入无形货币到2009年10月初希腊财政危机爆发，欧元区经历了相对稳定的十年，2002年1月1日开启欧元与国家货币的转换比较顺利，欧洲中央银行也成功地达成了将平均通货膨胀率控制在2%左右的目标。市场推进欧洲融合的神话一度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突出表现为欧洲边缘国家名义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北方。一方面，欧洲北部经济领先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在低位徘徊，特别是统一后德国因经济增长停滞不前一度被称为“欧洲的病夫”，另一方面，欧洲南方不发达地区经济迎头赶上，西班牙、爱尔兰和希腊的经济数据表现强劲，分别被誉为“西班牙奇迹”、“凯尔特之虎”和“正在形成的巨人”。<sup>②</sup> 但事

① [比] 保罗·德·格劳威：《货币联盟经济学》，汪洋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年版，第55—71页。

② Michael Bordo and Harold James, “The European Crisis in the Context of the History of Previous Financial Crises,”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vol. 39, Part B, 2014, pp. 275–284.

实上,经济上的失衡正发生在欧元区的南北两端,北欧出口导向型资本主义国家继续保持了以生产竞争力为基础的发展方式,而南欧内需导向型资本主义国家则陷入了经济金融化陷阱,最终,伴随着欧债危机的爆发,欧元区南北宏观经济失衡问题暴露在阳光之下。

探索欧元区的宏观经济失衡,欧元区南北资本主义模式差异的影响至关重要,存在三个至关重要的观察焦点。首先,北方出口导向型资本主义和南欧内需导向型资本主义的生产竞争力存在差异,北方国家有能力维系高质量多样化的生产,而南欧国家难以在全球化时代保持出口竞争力。其次,欧元区低通胀和固定汇率制度对于北方出口导向型资本主义和南欧内需导向型资本主义具有不同的经济意义,低通货膨胀有助于欧元区北方国家维系其在劳资关系谈判中的长期承诺,而欧元区的固定汇率制度也使得欧元区北方国家不必再担心南欧成员国使用贬值武器进行价格竞争,但南欧国家在加入欧元区后失去货币和汇率政策工具,却仍然要解决国内庇护主义关系网络产生的分配性矛盾,这使得欧元区南北竞争力进一步失衡。最后,加入欧元区带来的金融市场一体化为南欧带来了新的经济机遇,欧元区北方国家的经常项目盈余通过金融自由化渠道走向国际,以廉价贷款的形式流向南欧,为南欧国家的内需繁荣和资产价格泡沫提供了充足的流动性支持,但是,南欧国家因此陷入了经济金融化的陷阱,为债务危机埋下了伏笔。

首先,在生产竞争力方面,北方出口导向型资本主义和南欧内需导向型资本主义的生产竞争力本就存在差距。

由于技能培训制度方面存在根本性差距,北方出口导向型资本主义和南欧内需导向型资本主义在出口产品质量和创新能力方面存在差距。欧元区北方国家能够通过劳资长期承诺和学徒制培训机制大批量地培养高水平技术工人,这支持了具备持续的渐进式创新能力和高质量产品竞争力的生产体系,高质量、高附加值的专业化优势保护这些国家的企业免于在全球化时代参与低技能制造业的激烈竞争,占据高端制造业的出口市场。南欧国家不具备培养高水平技术工人群体的劳资关系和教育培训制度,除了定制奢侈品和个别汽车企业,其工业产品多以中等技术含量标准品为主,这意味着南欧国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通常需要进行价格竞争,出口部门利润空间有限,导致南欧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加依赖内需,使用宏观政策干预工具扩大内需的传统源远流长。<sup>①</sup>

---

<sup>①</sup> Óscar Molina and Martin Rhod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djustment in Mixed Market Economies: A Study of Spain and Italy,” pp. 223 – 252.

劳资关系制度的差异是造成欧元区南北生产竞争力失衡的另一个关键原因。加入欧元区后，欧元区北方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可控，而南欧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失控，二者的关键区分点在于能否促成劳资之间的长期承诺以及劳资谈判受到国际市场因素的制约程度。北方国家的劳资谈判在组织能力完善的雇主协会和工会之间进行，能够以行业为核心形成长期承诺，在长期雇佣制度和以质量竞争为导向的生产模式双重作用下，熟练技工在劳资谈判中的话语权较高，雇主方无法通过降低劳动力成本追求价格优势。与此同时，出口导向型发展策略意味着产业的发展受到国际市场竞争的制约，雇主方也有理由劝说工会将工资成本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以防止因工资成本过高造成企业竞争失利进而导致工人失业。总之，北方国家劳资双方具备在长期关系中共同获益的共识，而只有保障盈利能力才能达成共赢的长期承诺。这种长期主义关系与以低通货膨胀为核心目标的货币制度相匹配，低通货膨胀环境下工人名义工资的购买力不会短期出现大幅度贬值，进而工会没有必要频繁要求更换工资标准，劳资双方长期承诺的可信性因此提高。<sup>①</sup>

相比之下，南欧国家碎片化的劳资关系制度无法实现劳资之间的长期承诺。在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内需发展经常伴随着较高的通货膨胀政策，因为高通货膨胀率能降低储蓄意愿进而刺激消费，但同时，这也给予了工会组织频繁要求提高名义工资的理由。南欧国家的工资谈判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并不能够像欧元区北方国家那样以行业谈判为平台集中确定一个行业的工资水平。南欧国家的劳资谈判受到很多情势性因素影响，一个局部劳资谈判造成的工资变动往往会成为其他劳资谈判开启的原因，追求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并不是一个劝说工会组织节制工资的有效理由。由此，南欧资本主义的庇护主义特征再次凸显，劳资关系以频繁的分配性斗争为主要特征，国家经常不得不介入，以弥补关键行为者之间缺乏自主谈判能力的情况。<sup>②</sup>

在加入欧元区后，劳资关系制度差异被欧元区“一刀切”的货币政策放大，使欧元区南北两端在劳动力成本控制问题上走向了不同的道路。欧元区货币政策设定了2%的低通货膨胀总体目标，并据此设定了单一名义利率。这一通货膨胀

---

① Alison Johnston, Bob Hancké and Suman Pant,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 in the European Sovereign Debt Crisi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7, no. 13, 2014, pp. 1771 - 1800.

② Alison Johnston, Bob Hancké and Suman Pant,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 in the European Sovereign Debt Crisis," pp. 1771 - 1800.

目标参考了全部欧元区成员国所制定的平均通货膨胀率目标,而实际情况是,欧元区北方国家实际通货膨胀率低于平均水平,而南欧国家地区的实际通货膨胀率较高。由此,通胀率高于2%的南欧国家在名义利率减去实际通胀率后享受了过度宽松的实际利率,而通胀率低于2%的欧元区北方国家相应的享受了较高的实际利率。<sup>①</sup>

各地区不平衡的实际通货膨胀率与各自对应的劳资协调模式相互作用,造成了欧元区南北双方劳动成本的分化,北方出口导向型资本主义能够有效地控制劳动力成本,而南欧内需导向型资本主义的劳动力成本失控。在欧元区建立的最初5年,更高的实际利率限制了北方出口导向型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以德国为代表的一批国家的经济增长乏力。在高额实际利率限制下,德国国内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出口部门对于经济的重要性变得更加突出,这有利于劳资谈判中雇主劝说工会节制工资以提升出口竞争力。与此同时,德国施罗德政府推动了“哈茨改革”促进劳动力市场中灵活就业和低工资职位的增加。德国经济尽管经过一段低迷期但其以高端制造业为本的底色没有发生变化,产业竞争力反而因为劳动力成本的下降而有所提高。南欧内需导向型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形则相反,宽松的实际利率为南欧带来了数额巨大的廉价贷款,优越的融资形势催生了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在不受出口市场制约的碎片化劳资谈判制度下,以提高工资为目标的工会运动此起彼伏,最终拉高了南欧国家的单位劳动力成本,这加剧了南欧实体经济部门的竞争劣势。<sup>②</sup>

其次,加入欧元区使南欧国家失去了贬值武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再也无法通过贬值创造价格优势与德国产品竞争欧洲市场的份额,也不再能够通过独立的货币政策修正自身存在的通货膨胀劣势,这进一步加剧了欧元区区域内经常项目贸易失衡。<sup>③</sup>

在加入欧元区以前,南欧国家惯于使用名义汇率贬值工具,主要目的是抵消

---

① Bob Hancké, “The Missing Link: Labour Unions, Central Banks and Monetary Integration in Europe,” *Transfer*, vol. 19, no. 1, February 2013, pp. 89 – 101.

② Martin Höpner and Mark Lutter, “One Currency and Many Modes of Wage Formation: Why the Eurozone Is Too Heterogeneous for the Euro,” MPIfG Discussion Paper 14/14, August 2014, <https://www.mpiifg.de/people/mh/paper/Hoepner%20Lutter%202014.%20One%20Currency%20and%20Many%20Modes%20of%20Wage%20Formation.pdf>.

③ Alison Johnston and Aidan Regan, “European Monetary Integration and the Incompatibility of National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pp. 318 – 336.

掉国内通货膨胀造成的出口产品价格劣势，这种名义汇率贬值会拉高南欧国家的利率，从而造成在国际上借贷更加困难，换言之，名义汇率贬值在提升出口产品价格竞争力的同时还能够有效地防范南欧国际债务的累积。加入欧元区后，由于欧洲中央银行的低通胀政策目标是以成员国之间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准，并不能够像盯住西德马克时代那样敦促南欧国家跟随德国进行通货紧缩，欧元区南北之间的实际通货膨胀率差异逐渐累积，进一步造成以价格竞争为主要切入点的南欧国家的出口竞争力下滑，欧元区内部贸易失衡因此持续的分化。<sup>①</sup>

与此同时，加入欧元区后成员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和货币关系同样产生了不对称后果，这种不对称对于欧元区的生产分化和金融风险累积都具有促进作用。21世纪全球化时代开启了一轮世界产业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在东亚形成集群，对欧洲老牌工业国家产生了外部冲击。这一外部冲击对欧元区成员国产生了不对称的影响，出口产品以质量竞争为主的欧元区北方国家仍然能够保持甚至加强自身外部竞争力，中国的崛起对欧元区北方国家出口的机械和设备产品产生了强劲需求。但是，南欧国家的区域外贸易平衡表现却急剧恶化，所出口的一般质量工业品与新兴工业国的产品之间形成了直接的替代竞争关系，东亚地区新兴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具备更低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而欧元区成立后长时间的欧元汇率高企使得南欧国家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进一步的削弱。<sup>②</sup> 简而言之，面对世界产业格局变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欧元区北方国家的质量竞争优势保障了自身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持续发展，而南欧国家则失去了出口领域的竞争优势，面临着寻找替代性增长点的问题。

最后，欧元区成立后欧洲金融市场的重塑是理解欧元区南北失衡的又一个关键切入点，欧元区北方国家扮演了廉价信贷提供者角色，南欧国家则在输入性廉价贷款的催化下走向了债务导向型的发展，欧元区债权人与债务人角色由此形成。

欧元区的初始设计重视对于公权力部门的控制，而赋予金融市场过高的信任。欧元区的创设者认为金融市场能够自发实现有序的调整，对于炒作房地产、

---

① Alison Johnston and Aidan Regan, "European Monetary Integration and the Incompatibility of National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pp. 318 - 336.

② Ruo Chen, Gian Maria Milesi-Ferretti and Thierry Tresselt, "External Imbalances in the Eurozone," *Economic Policy*, vol. 28, no. 73, 2013, pp. 101 - 142; Ferdi De Ville and Mattias Vermeiren, "The Eurozone Crisis and the Rise of China in the Global Monetary and Trading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n Asymmetric Shock,"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vol. 14, no. 5, 2016, pp. 572 - 603.

资本证券化和金融杠杆中隐藏的风险疏于防范,欧元区创设之时并没有设计关于金融市场失控带来威胁的防控措施。<sup>①</sup>在加入欧元区后,南欧内需导向型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生产竞争中逐步的丧失竞争力,与此同时,全球金融市场发展和欧元区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为南欧国家输入了易得的廉价贷款,使这些国家的经济陷入了金融化陷阱。

欧元区债权人和债务人分化的故事始于北方出口导向型国家所赚取的盈余。由于生产的产品具备优异的质量竞争力,欧元区北方国家赚取了大量的出口盈余,这些盈余首先转化为这些国家的银行储蓄。欧元区的成立在两个方面刺激了北方国家将资金投入南欧的资产市场。一方面,欧元区取消了南欧国家的汇率操控权,欧元区成员国之间的汇率不可逆地固定了下来,投资者再也不必担忧南欧货币贬值造成的损失;另一方面,欧元区金融一体化途径降低了跨区域投资的交易成本,欧洲央行参照平均通货膨胀率制定利率的方法造成了南欧国家的实际利率大幅下降,在北方国家的投资者看来,向南欧资产市场投资是一个比在本国储蓄更为有利可图的选择,资金因此开始大量的南下进入金融、房地产和建筑市场追求更高的资本边际回报率。<sup>②</sup>

对于南欧国家而言,由于加入欧元区后生产竞争力的衰落,迫切需要谋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以支持其内需增长型发展模式,使用外来流入资金的重要性因此突显。南欧国家的庇护主义特征对于金融化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伴随着竞争力下降和由此带来的失业威胁,南欧的社会团体开始更为积极地寻求庇护,希望通过昔日积累的政治影响力分配到更多的特权资源。与此同时,南欧政府的工具箱中则失去了贬值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等重要的调控工具。恢复竞争力的改革需要系统性的改变南欧社会系统,因此难以推进,在重重困难面前,利用易得的国际廉价贷款推进债务推动型发展成为对南欧国家最有吸引力的选择,债务支持的发展并不利于竞争力的恢复,但能够快速产生经济增长效应。<sup>③</sup>由此,南欧国家政府放任私人

---

① Robert Boyer, "Origins and Ways Out of the Euro Crisis: Supranational Institution Building in the Era of Global Finance," *Contributions to Political Economy*, vol. 32, no. 1, 2013, pp. 97 - 126; Robert Boyer, "The Euro Crisis: Undetected by Conventional Economics, Favoured by Nationally Focused Polity," pp. 533 - 569.

② Ansgar Belke and Christian Dreger, "Current Account Imbalances in the Euro Area: Does Catching up Explain the Develop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21, no. 1, 2013, pp. 6 - 17.

③ 安克·哈瑟尔:《欧元区的调整:资本主义多样性和南欧危机》,姬璐、朱洁译,《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8期,第14—24页。

债务增加，以此减少增加公共转移的需求，没有为债务驱动型增长机制设置安全阀。

在欧元区建立的前十年，两种资本主义形成了一种双赢的互补关系，北方国家的资金得到了收益更高的投资渠道，而南欧国家则享受到了低利率和快速的经济增长。<sup>①</sup> 在这一过程中，南欧国家的债务总额逐渐累积到了危险的程度。欧元区的建立不仅在消除汇率风险和赋予低利率方面刺激了对南欧的投资，同时严重影响了南欧国家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加入欧元区后，成员国失去了以自身完全控制的货币发行债务的能力，当债务出现违约风险时，任何一个成员国的政府都无法全权支撑欧元的价值，因此，欧元区的债务国不能向债券持有人保证到期时总会有现金支付，由此，当债券出现问题时流动性危机很容易地演变为偿付能力危机。在金融市场中，这种缺乏政府信用保障的债券易于受到冲击，其动力中有一种自我实现的因素，当投资者担心违约时，他们的挤兑行为会让违约风险变得更大，换言之，由于投资者担心违约，一个国家可能会资不抵债。<sup>②</sup>

南欧出售金融资产为经常项目失衡融资的方法非常依赖金融市场的乐观预期。如果资产价格上涨，可能导致投机性的繁荣，投机性投资者的收益陡然增高并引起其他投资者的效仿。而如果泡沫被戳破，价格就会下跌，不确定性就会增加，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对货币和安全资产的需求会陡然增加，风险资产将被出售，欧元区南北之间的互补关系可能会因为金融市场的波动而在一夜之间消失。<sup>③</sup> 这种局面凸显了南欧国家金融化的依附性特征，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后南欧国家与美国都选择了开放国际国内金融市场，推动了基于债务的经济发展模式，但南欧国家并不具备美国在世界金融市场中的影响力，美国可以依靠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向国际转移风险，危机爆发后逆周期操作能力较强，但南欧国家则无力阻止国际资本的撤出。<sup>④</sup>

在欧元区前十年的稳定发展之下潜藏着欧元区南北之间的经济模式分化，形

---

① Torben Iversen, David Soskice and David Hope, "The Eurozone and Political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9, no. 1, 2016, pp. 163 - 185.

② Paul De Grauw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Euro," pp. 153 - 170.

③ Engelbert Stockhammer,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and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on Eurocrisis,"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Society (PKES), Working Paper 1813, October 2018, [http://www.postkeynesian.net/downloads/working-papers/PKWPI1813\\_iwmBUZS.pdf](http://www.postkeynesian.net/downloads/working-papers/PKWPI1813_iwmBUZS.pdf).

④ Engelbert Stockhammer, "Neoliberal Growth Models, Monetary Union and the Euro Crisis: A Post-Keynesian Perspective,"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21, no. 4, 2016, pp. 365 - 379.

成了脆弱的南北金融互补关系。南欧国家在欧元区建立前十年取得了经济增长但却没有实现健康的经济发展,私人债务和公共债务的大幅增加暂时掩盖了竞争力的丧失。这种债务导向性增长过分依赖于北方国家的自愿借款,易得的廉价信贷支撑了南欧国家不断增加的家庭债务、强劲的消费需求和以房地产市场为代表的资产市场繁荣,但却与可贸易部门的生产要素增值无关。南欧经济中与金融化齐头并进的去工业化,使其丧失了经济危机后自主复苏的能力。欧元区北方国家提供的廉价贷款以逐利为目的,一旦债权人感知到他们的投资存在难以偿付的风险,这些资本将在短时间内大规模外逃进而造成地南欧国家信贷枯竭,需求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将难以为继。<sup>①</sup>

总而言之,欧元区的超国家制度安排在长周期中有利于北方出口导向型资本主义,不利于南欧内需导向型资本主义,其结果造成了欧元区发展的失衡。在生产竞争力领域,欧元区北方国家的生产竞争力优势能够得到维持,在低通货膨胀率下能够保障劳资双方的长期承诺有效,而南欧则在失去贬值武器和名义利率低估双重作用下放大了其创新能力不足和无法控制劳动力成本的缺陷。金融领域方面,欧元区北方国家和南欧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脆弱的债权人和债务人互补关系,出口导向型国家的出口盈余资金在加入欧元区后不必担心汇率贬值风险,因此,大量南下南欧国家,在消费、金融和房地产市场享受名义利率低估带来的通货膨胀优势,而南欧国家在竞争力衰退的背景下也乐得通过增加债务继续维持内需,走向经济金融化暂时保障了经济增长,暂时安抚了内部纷繁复杂的庇护主义组织。伴随着南欧国家债务的日益提高,这些国家陷入了依附式金融化陷阱,在金融市场波动面前异常脆弱,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其自身自救能力和欧元区能够提供的制度支持都不足以抵御危机的侵袭。<sup>②</sup> 伴随着2009年末希腊债务危机的爆发,金融危机在欧元区迅速传染,欧元区北方国家投资者回笼资金,而南欧国家失去了流动性供应,欧元区稳定十年所展现出的共同繁荣由此被打破,欧元区

---

① Gregory W. Fuller, "Exporting Assets: EMU and the Financial Drivers of European Macroeconomic Imbalances,"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23, no. 2, 2018, pp. 174 - 191.

② Andreas Nölke, "Economic Causes of the Eurozone Crisis: The Analytical Contribution of Comparative Capitalism," *Socio-Economic Review*, vol. 14, no. 1, 2016, pp. 141 - 161; Peter A. Hall,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in Light of the Euro Crisis,"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25, no. 1, 2018, pp. 7 - 30; Alison Johnston and Aidan Regan, "Introduction: Is the European Union Capable of Integrating Diverse Models of Capitalism?"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23, no. 2, 2018, pp. 145 - 159.

严重的南北经济失衡问题暴露在阳光之下。欧元区北方国家因实体经济稳固而经受住了金融危机的考验，而南欧国家因失去流动性而陷入银行业危机，对银行业的救助进一步恶化了南欧国家的财政，诱发了主权债务危机，最终，为走出危机的泥潭，南欧国家不得不向国际求援。

## 六 危机后欧元区不同资本主义模式国家的冲突

欧元区危机的爆发开启了新一轮制度变革，如果仅从制度形式视角看，欧元区上演了一场“危机促进一体化进步”的故事，欧盟层次的宏观经济治理工具箱得到了完善，欧元区货币制度集中而其他经济治理制度分散的情况有所改观。但是，危机后货币联盟成员国之间的政治紧张关系并没有因制度建设进程的推进而得到缓解，反而显得旷日持久。欧元区国家之间就危机治理成本的分配和欧元区宏观经济制度改革战略方向的纷争持续不断，究其根源，仍然是不同资本主义模式偏好不同货币制度模式带来的兼容性问题。

法国和德国两种制度蓝图的竞争构成了欧元区制度重塑阶段纷争与妥协的重要内容，法国在后危机时代看到了争取欧元区领导权的新机遇，联合同样具有干预性货币制度传统的南欧债务国，试图改造以德国货币制度模式为蓝本的欧元区旧制度。在经济层面，法国没有站在欧元区结构性不平衡的任何一个极点，没有像北方出口导向型国家那样保持在出口市场拥有卓越的竞争力，也没有像南欧一般陷入金融化的陷阱。但是，在欧元危机后的制度重塑的历史节点上，法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政治作用，成为与德国在谈判桌上最重要的博弈对象，法国对于欧洲货币联盟的政治诉求不容忽视。欧债危机的爆发暴露了欧元区的设计缺陷，依据德国秩序自由主义蓝图设计的欧元区制度框架缺乏危机预警机制和最后贷款人机制，欧元区北方债权人集团和南方债务人集团就危机治理成本如何分配问题爆发了激烈的矛盾。法国利用这一历史机遇团结陷于困境的南欧债务国，呼吁使用更为灵活务实的危机治理方案应对危机，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和风险共担的欧元区经济治理新模式，这种建立干预性宏观经济治理制度的倡议与法国和南欧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更为匹配。

欧元区前十年，在德国秩序自由主义框架下形成了基于货币主义理论和真实商业周期理论的“布鲁塞尔—法兰克福共识”，经济学家保罗·戴·格劳威将这

一共识概括为：(1) 用增进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方法帮助成员国独自应对危机；(2) 通过《稳定与增长公约》限制国家财政赤字，使国家在商业周期波动冲击到来时有灵活的财政空间应对冲击；(3) 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被视为完全有能力为欧元区提供宏观经济稳定，不必要进行需求侧宏观调控，而对于供给侧变化货币政策是无能为力的；(4) 金融市场有自我监管能力，欧洲中央银行没有必要担心金融稳定，稳定的价格水平维系了有效的金融市场，私人投资者会在市场价格信号引导下做出正确的决定，能够保证金融稳定。<sup>①</sup> “布鲁塞尔—法兰克福共识”认为货币是中性的，而市场是配置资源最为有效的途径。受到这些教条的影响，欧元区长期奉行非干预性的小政府式治理。

希腊危机爆发后，小政府理念导致欧元区政策工具箱中缺少应对金融危机的工具，“布鲁塞尔—法兰克福”共识在快速传染的危机中崩溃。金融危机的治理关键在于迅速恢复市场信心，重塑金融体系的信誉，而欧元区却没有最后贷款人制度和财政转移支付机制，《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中欧洲央行不具备最后贷款人功能，成员国之间遵循“不纾困”条款，一旦发生危机，欧元区成员国也无法及时得到盟友国家的援助，缺乏制度化方案提供金融稳定公共物品。欧洲中央银行不能及时且合法地站出来向市场无限量提供流动性，金融市场的恐慌情绪因此难以迅速平复，这种困境一直拖延到2012年7月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第一次公开宣布“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欧元”。由于正式制度的缺位，欧元区成员国只能依靠交易成本高昂的政府间谈判解决问题，各方利益的冲突对立导致集体行动的组织缺乏效率，其结果是债务国得到援助之时，宝贵的时间资源已经被浪费，危机对受冲击国家的损害因拖延而更加剧烈。

欧元危机彰显了欧元区政治领导力的缺失，这与欧元区经济最强国德国的“旁观者”立场息息相关。德国具备在欧元区建立一种“良性霸权”的经济实力，但出于其对于稳定文化的偏爱，德国总是对于南欧盟友保持一种戒备的心态，并因此对于欧元区协调集体行动问题积极性不足。这种“旁观者”式的姿态具有强大的国内政治基础，一方面，“马克民族主义”情绪在德国具有坚实的历史基础，在很多德国民众看来，失去马克换取欧洲盟友承认是一场无奈的政治交易，故而对于欧元区领导权和集体事务的责任感都并不强烈；另一方面，两德

<sup>①</sup> Paul De Grauw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Euro,” pp. 153–170.

统一和欧元区成立初期德国经历了经济的低迷，带来了工资停滞和经济不平等水平增加，这使得一般德国民众对于欧元区事务的热情不高。<sup>①</sup>

在很多德国人看来，欧元危机的爆发验证了自己在欧元区创设谈判中所提出的担忧，南欧国家的政府缺乏稳定文化和财政纪律，与这些国家共处于同一个货币联盟之中为德国经济带来卷入灾难的风险。在德国的视角下，欧元区被分化为“圣徒”和“罪人”两个集团，“圣徒”集团包括德国、芬兰、奥地利、荷兰等坚持执行紧缩政策和严格财政纪律的国家，而陷于危机的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则因为挥霍无度背负了相应的“原罪”。在“圣徒”集团看来，对于债务国的援助和债务重组会纵容不负责任的政策，陷于债务危机的国家应该自己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德国对于债务国提供的援助主要是为了保障债务国有能力归还德国银行业所持有的债券，而提供援助的前提条件是债务国改革经济政策方针，严格执行紧缩政策。这种对立的思维方式加剧了债权国和债务国之间的互不信任，债权国不愿意积极对债务国的经济复苏施以援手，而债务国则抱怨与援助相绑定的紧缩政策使经济持续低迷和失业率居高不下，“懒惰的南方”和“吝啬的北方”相互攻讦，成为无法凝聚共识的身份政治之争。<sup>②</sup>

以德国为代表的北方国家既是强大的又是被动的。在危机冲击面前，欧元区北方国家迅速稳固了阵脚，并掌握了对债务国援助的控制权，在与债务国的谈判中享有更高的议价能力，迫使南欧国家接受了紧缩政策。但是，在快速传染的危机面前，北方出口导向型资本主义无法固守其秩序自由主义偏好，欧元区国家经济深刻的相互依赖使它们难以独善其身，如果不扑灭债务国的危机之火，危机的持续发酵最终会损害整个欧元区的信誉，从而导致债权国集团的损失。故而，在危机发展的紧急时刻，北方国家不得不务实地做出妥协，允许欧元区实现转移支付和风险共担，同意协助建立必要的危机治理制度。从这个角度看，北方国家被欧元区内负面相互依赖效应所绑架，在危急时刻到来之时，不得不放松其秩序自由主义主张，接受妥协方案应对近在眼前的危机。<sup>③</sup>

在欧洲货币联盟问题上，法国在大战略层次一直追求欧洲的领导权，有强

① 丁一凡：《欧债危机启示录》，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第22—26页。

② Matthias Matthijs and Kathleen McNamara, “The Euro Crisis’ Theory Effect: Northern Saints, Southern Sinners, and the Demise of the Eurobond,”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 37, no. 2, 2015, pp. 229–245.

③ Joachim Schild, “EMU’s Asymmetries and Asymmetries in German and French Influence on EMU Governance Reforms,”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 42, no. 3, 2020, pp. 449–464.

烈的增强其对欧洲货币事务话语权的政治需求，并存在追求建立干预性的“欧洲经济政府”的战略传统。<sup>①</sup> 法国在欧元危机中看到了平衡德国国际经济权力的可能性，希望借危机提供的历史机遇联合南欧国家推行自身“欧洲经济政府”主张。法国和南欧国家都存在强国家干预的传统，在经济危机面前，使用有力的国家干预手段平复危机，推出刺激计划助力经济增长被这些国家认为是公权力机关的应有之义。因此，法国在欧债危机中积极联合南欧推进更具干预性的欧洲货币联盟改革方案，谋求改变欧元区货币一体化与其他经济领域一体化程度不足的局面，主张放松对南欧的紧缩政策，建立财政转移支付联盟，对欧元区的风险进行分摊，使用刺激性政策为欧元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以新的经济增长帮助南欧国家渡过难关。

南欧债务国为了换取欧元区北方国家提供的援助资金，被迫接受了以内部贬值为核心的紧缩政策，这就需要削减公共开支和增加税收，并进行结构性改革。这些措施旨在减少国内需求和国内价格通缩，造成了南欧国家失业率上升、工资下降、资产价格通缩和经济衰退。欧元危机的重要结果是南欧缺乏刺激经济复苏的资金资源，金融市场恐慌造成的流动性危机，资本市场中避险情绪占据了主导，造成资金大量的撤出南欧。在拥有货币主权的时代，南欧国家的政府大概率会选择使用干预性的刺激政策，以国家信誉为后盾向本国市场注入流动性，以防止本国经济体系陷入通货紧缩危机。但是，在欧元区危机治理进程中，南欧国家受到财政紧缩条款的限制，无法运作这些刺激性措施。财政紧缩和控制劳动力为主的“内部贬值”战略并不足以重塑南欧债务国的价值创造体系，使之重新获得竞争力以支撑经济增长。正如斯蒂格利茨的观察，“三驾马车”所提供的结构性改革方案将过多的精力用于限制财政支出、调控非贸易消费品市场和控制劳动力成本，而在对重塑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的一些方面却投入不足，这些方面包括：促进产业发展，加大对于基础设施和教育研发的投入，以税收减少社会不平等和促进平权，惩戒腐败和规范金融资本，优化碳排放标准促进可持续发展等。<sup>②</sup> 在这一情势下，法国所提出的建立干预式经济治理模式的方案契合南欧陷

① 朱宇方：《欧洲经济政府？——解析欧洲货币联盟经济治理机制的德法之争》，《德国研究》2011年第4期，第21—26页。

② [美] 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欧元危机：共同货币阴影下的欧洲》，蔡笑、于晓潭、冯睿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第208—230页。

于危机国家的利益需求，故而南欧国家为主的债务人集团团结在法国的周围，试图突破欧元区北方国家所主张的各国风险自担方案，以期快速走出危机困境，实现经济增长和就业率上升。

欧债危机处理体现了两个集团之间的妥协。北方出口导向型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经济优势占据了一定的主动权，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中央银行为债务国提供援助纾困，但要求债务国以严格的紧缩政策削减财政赤字，进行结构性改革以提升自身的竞争力。但是，在危机治理进程中，以德国为首的北方国家所倡导的以稳定文化为核心的货币联盟原则被打破，法国和南欧国家联合推动欧元区经济治理改革，使得欧元区的经济权力呈现出集中化趋势，在财政转移支付、非常规货币政策、银行业联盟、共同债券等方面取得改革突破。伴随着欧元区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箱日益丰富，布鲁塞尔和法兰克福的超国家治理机构的经济权力显著上涨，并开始将经济增长、促进就业、纠正经济不平衡等干预性政策目标深刻地植入治理规范之中。德国倡导的以稳定文化和成员国风险自担为特色秩序自由主义因素在欧元区逐步褪色，而法国所主张的“欧洲经济政府”模式日益凸显。

欧元危机时代，由于欧元区危机对于普通民众生活的恶劣影响，围绕欧元区治理问题的大众政治兴起，这意味着欧元区改革不再是一个由一小圈政治精英决定的事务，欧元区内部协调问题因此进一步的复杂化。在危机后民粹主义兴起的时代背景下，反欧元议题成为民粹主义政党吸引选票的重要口号，伴随着大众政治中的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上升，民粹主义力量对欧元区建制派力量的掣肘在加强。危机为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提供了历史机遇，通过增加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失败者的政治代表性，一系列民粹主义政党在后危机时代成功地从“抗议型政党”转变成了“代表型政党”，通过吸收建制派未能代表选民的选票成为各国国内政治博弈中不容忽视的玩家。<sup>①</sup> 在欧元区北方国家，民粹主义政党质疑对债务国援助的正当性，认为南欧国家陷入债务危机是腐化堕落的生活方式造成的，应该自己吞下不负责任的财政的苦果，芬兰“正统芬兰人党”（The True Finns）、奥地利“施特纳赫党”（Team Stronach）和德国“德国新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都通过炒作反欧元、反救助议题而在选举政治中获得

<sup>①</sup> 田野：《全球化、要素禀赋和政党重组——对欧洲民粹主义浪潮的一项解释》，《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10期，第43—54页。

了更多的席位。债务国集团方面,民粹政治着眼于反抗紧缩政策带来的经济萧条和失业,一批民粹主义政党打起反欧元的旗号吸收选票,宣传自己是欧元区失败者的代言人,并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政治成绩,法国“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意大利五星运动”(Movimento 5 Stelle)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在葡萄牙、西班牙和爱尔兰选举中,都出现了极左翼激进反欧元力量选票大增的现象。<sup>①</sup>2015年6月,希腊齐普拉斯政府就是否接受援助国提出的第三次纾困条件发动希腊全民公投,61%的希腊投票者不接受纾困条件,险些让希腊成为第一个退出欧元区的国家<sup>②</sup>。

在一个充满变革的时代,民粹主义政治在反欧元议题下的发展值得予以充分重视,这股政治思潮展现出危机后欧元区政治合法性并不牢固,欧元区不同国家民众之间对于欧元区达成的妥协方案都存在不满情绪,欧元区北方民众对于援助南欧盟友的容忍程度有其极限,南欧民众对于北方国家提出的紧缩政策感到厌恶,其根本原因是欧元区共同货币政策难以契合各国差异化的货币政策需求。欧元区进一步发展的困境来自深层共识的缺失,尽管欧洲政治精英中的主流仍然希望通过进一步完善欧元区的制度框架巩固欧洲一体化成果,但对于一系列问题却难以顺利达成一致意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欧元区?如何更好地协调共同货币带来的分配性效应?如何组织欧元区集体行动?不同阵营的出发点是与自身资本主义模式和货币制度偏好息息相关的,并因此难以达成一致意见,使得纷争旷日持久。

## 七 结论

本文引入资本主义多样性视角,考察欧元区的比较政治经济基础问题,认为欧元区实现共同繁荣的障碍是不同资本主义模式的兼容性问题。欧元区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选择了以德国货币制度为蓝图的货币治理模式,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制度偏向性,此后欧元区成员国之间的宏观经济失衡和危机后的政治纷争都源于

---

<sup>①</sup> Brigid Laffan, “The Eurozone in Crisis: Core-Periphery Dynamics,” in Desmond Dinan, Neill Nugent and William E. Paterson, eds., *The European Union in Crisis*, London: Palgrave, 2017, pp. 131–148.

<sup>②</sup> 按照公投规则,这意味着希腊民众选择退出欧元区,但事后事情峰回路转,2015年9月希腊重新选举后新政府与援助国谈判,基本接受了第三次纾困的附加条件。

此，因为不同资本主义模式在货币制度需求方面存在深刻而持续性的差异。

欧元区资本主义存在多样性，不同资本主义模式在历史上形成了与自身经济运行方式相匹配的货币制度需求，这些需求并没有因为加入欧元区而发生变化。具体而言，欧元区北方出口导向型资本主义需要低通货膨胀为核心的稳定导向的货币政策，因为低通货膨胀有利于保障内部劳资谈判形成的名义工资购买力稳定，进而巩固社会团体之间的长期承诺，维护以质量竞争为核心的生产体系的运行。南欧内需导向型资本主义则需要干预性的货币制度，在加入欧元区前频繁地使用通货膨胀刺激内需，辅之以主动汇率贬值提高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这种频繁干预的货币政策的成因是南欧资本主义中庇护主义关系广泛存在，难以形成如欧元区北方国家那样有利的生产组织，政府的干预性政策成为平衡社会团体冲突的关键。法国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的货币政策偏好发生过波动，在二战后由强国家主导的经济腾飞期间建立了强控制的货币制度，但伴随着1968年政治风波后法国摒弃凯恩斯主义走向自由化改革，在20世纪80—90年代的欧元区创设阶段试图通过欧洲货币一体化条约促进国内加强预算纪律和保持货币稳定的改革。欧元危机后，法国通过强国家干预方式快速走出危机，重塑了干预性货币政策的正当性，并借危机引发欧元区制度重塑的历史机遇联合南欧国家对抗以德国为首的欧元区北方债权国，意图将欧元区引向法国所偏爱的“欧洲经济政府”模式，增加法国在欧洲宏观经济事务中的领导权。

在欧元区的创设阶段，欧元区创始成员国同意建立一个以德国货币模式为内核的货币治理制度，独立的中央银行和物价稳定为核心的货币政策是其突出特征，不同资本主义对货币制度偏好的差异没有被充分考量，这是一系列时代条件造成的。在国内层次，德国坚持自身货币制度模式，而法国和南欧国家处于改革时代，希望突破二战后的干预性宏观经济制度框架，尝试建立稳定导向的宏观经济治理机制。在国际层次，欧元区创设进程为精英政治控制，受到当时占据主流的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以德洛尔委员会为代表的欧元区制度设计者普遍认可货币主义经济理论和德国货币模式的标杆地位，而德国重新统一提供的地缘政治契机则起到了关键的促进催化作用，促成了以德国治理模式为内核的欧洲货币一体化。这一进程中，不同资本主义模式的不同货币政策偏好问题被边缘化了，人们期望在货币一体化后通过统一大市场的作用实现欧元区经济的实质趋同和成员国共同繁荣，这为此后欧元区的经济失衡与政治纷争埋下了隐患。

在欧元启动到希腊财政危机爆发期间,欧元区国家的账面经济数据出现趋同,但经济发展方式出现了结构性的分化,为此后的危机和失衡埋下了种子。欧元区北方出口导向型资本主义保持了生产的竞争力,以高端制造业为基础的经济结构能够承受金融危机的冲击,而南欧内需导向型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了一段经济繁荣时期后,最终转向金融化,积累了债务风险。欧元区的金融自由化机制促进了跨境资本流动,加入欧元区后,南欧资产市场通货膨胀率高于欧元区平均水平,带来了更大的利润预期,而共同货币使得北方国家不必担忧向南欧投资的汇率风险,可以放心地将自身赚取的出口盈余投资南欧资产市场,南欧国家因此得到了充沛的廉价贷款。在廉价贷款的帮助下,南欧国家的经济陷入了金融化,债务泡沫的积累为随后的欧元区危机带来了隐患。

欧债危机爆发后,欧元区进入了新的制度改革阶段。带有德国秩序自由主义底色的旧共识被推翻,欧元区成员国开始根据自身资本主义模式需求提出改革方案,并因此在欧元区改革方向问题上产生了深刻的分歧。以德国为首的欧元区北方国家将危机归因于南欧国家,并在欧元区危机治理和改革进程中继续坚持以稳定文化为底色的立场,而法国和南欧国家则希望借危机带来的改革契机,将欧元区改造为一种更具干预性的宏观经济治理结构,通过财政转移机制、欧元区共同债券和非常规货币政策帮助南欧国家走出困境,改变欧元区宏观经济制度与自身资本主义模式需求不匹配的状况。

综上所述,欧元区资本主义模式的兼容性问题贯穿欧元区创设、发展、危机和改革的全过程,作为一种深刻的矛盾,还将会继续影响欧元区的运行。资本主义模式兼容性问题提示研究者从制度需求角度思考欧元区的发展,虽然危机后欧元区的制度改革卓有成效,修正了因货币一体化超前而其他经济领域一体化滞后造成的制度不对称,似乎再次上演了一出“危机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故事,但制度如果不能满足欧元区成员国的利益诉求,则长周期中制度的稳定性和效能都将受到影响。欧元区面临的困境来自不同的资本主义模式有不同的宏观经济治理制度需求,而超国家层次只能有一套“一刀切”的制度,这一矛盾产生了一个遗憾的悖论,单一的货币制度必然有其偏向性,很难成为承载共同繁荣和政治团结的基石。